

论浙江精神的“唯实论”底色

——基于古今浙江籍近百位思想家的思想文献考察

王文华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浙江杭州 310018)

[摘要]基于对古今近百位浙江籍思想家学术思想的系统考察,认为“唯实论”是浙江精神最核心的底色。即在本体论上表现为“道不离器”的求实精神,拒斥悬空虚理,在具体事物与历史实践中探寻普遍规律;在价值论上表现为“崇义养利”的务实精神,打破义利对立的教条,为人的合理利益与物质追求提供道德正当性;在实践论上表现为“知行合一”的践实精神,强调知识必须转化为行动,在实践中完成真理的证成。三者构成“求实—务实—践实”的三位一体结构,共同塑造了浙江人“从现实出发、注重实效、敢于行动”的思维与行为方式,并为理解“浙江现象”提供了基于文化哲学层面的深层解释。

[关键词]浙江精神;唯实论;道不离器;义利双行;知行合一

[作者简介]王文华(1984—),男,湖北蕲春人,浙江金融职业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中国哲学。

[基金项目]本文系浙江金融职业学院2023年度校级金院重点科研项目“浙江精神的思想渊源研究——百位浙江籍思想家评介”(项目编号:2023JY05)阶段性成果之一。

[DOI] <https://doi.org/10.62662/llyj0204026>

[中图分类号] B2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llyj2025@163.com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从一个资源小省迅速崛起为经济大省,形成“浙江现象”,其根源是“浙江精神”。“浙江精神”作为学术概念,2000年概括为16个字:“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2006年统一表述为12个字:“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2016年,G20杭州峰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对浙江工作提出了“秉持浙江精神”的新要求:“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浙江精神到底有何魅力?浙江人为什么会如此思考和行为?这种独特的认知结构与价值选择,其哲学根源究竟在何处?

本文认为浙江精神的本质,并非仅仅是地理环境、经济模式或历史事件的直接产物,它更是两千多年来区域学术思想传统——“浙学”——长期浸润与积淀的结果。基于课题“浙江精神的思想渊源研究”,对从东汉王充到近现代马一浮等百余位浙江籍思想家的原始文献进行了系统梳理与分析,发现一个共性特征:无论这些思想家分属何种学派、处于何种时代,他们的论述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指向

一个核心范畴——“实”。无论是王充对“虚妄”的激烈批判,还是陈亮、叶适对“事功”的执着捍卫,无论是王阳明对“知行合一”的哲学革命,还是黄宗羲对“力行实学”的毕生倡导,其思想深处都贯穿着一种以“实”为最高价值取向的哲学自觉。这种哲学自觉,我们称之为“唯实论”,亦是浙江精神的哲学底色。

二、“求实”:“道不离器”的本体论

一切哲学思考的起点,都是对世界“是什么”即本体论的回答。浙江精神的哲学底色即是浙学思想家们对“道”与“器”、“理”与“物”这两对核心范畴的独特见解。与程朱理学不同,浙学传统表现出强烈的“求实”倾向,即拒绝悬空的、超验的“道”或“理”,坚持认为普遍的规律与本质(道)就存在于具体的事物(器)、民生日用以及鲜活的历史变迁之中。这一“道不离器”的本体论,为浙江精神奠定了最根本的“求实”内核。

(一)王充:“实事求是”与批判性求实精神

追溯浙江精神哲学范式的源头,首推东汉时期的王充,后世学者几乎一致将其视为“浙学开山

祖”。吴光先生指出:“浙学以东汉王充为开端,其‘实事求是’的批判精神与求实态度,深刻影响了后世浙江思想家的治学取向。”这一判断是准确的。王充生活的时代,谶纬神学弥漫,天人感应之说盛行,虚妄迷信思想盛行,而王充勇敢地举起了批判的大旗。他明确宣示:“《论衡》实事求是……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所谓“实事”,即是以事实为依据;所谓“疾妄”,即是批判虚妄。这一宗旨,本质是要求将认知建立在现实经验基础上的哲学宣言。王充对“虚妄”的批判是全方位的,他批判天人感应,批判鬼神迷信,批判厚古薄今,都贯穿着强烈的理性精神与实证意识。究其根本,源自王充的“元气自然”论宇宙观,他认为“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否定天有意志、能赏善罚恶的神学目的论,认为天道运行源于“元气”的自然运作,不存在任何超自然的主宰。这一思想将天道从人格神或道德意志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拉回到现实的物质世界,这为后世浙江思想家确立了一种最重要的精神气质: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二)南宋事功学派:“道在器中”本体论建构

王充的求实精神还主要停留在对虚妄的“破”的层面,而到南宋时期的以陈亮、叶适为代表的事功学派,则在与朱熹理学的正面论战中,完成了一套“道在器中”的本体论哲学建构。这场论战的焦点之一,就是关于“道”的性质与存在方式。朱熹秉持一种超验的道本体论,认为“道”是一种至善的、超越具体历史经验的绝对存在(天理)。这一观点将“道”悬置于具体历史进程之外,使其成为一种与人间事务无关的抽象存在。陈亮对此进行了激烈的反驳,他质问朱熹:“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长存乎?”在陈亮看来,“道”绝非与世隔绝的抽象之物,而是内在于现实万事万物之中,并通过具体的历史活动展现自身的必然法则。他提出了“道存于物”的哲学命题,强调“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因此,“道”的呈现离不开具体的事物与人事,“道”的实践也离不开现实的事功。与陈亮同时期的叶适将这一本体论思想推向了更为精深的理论层面。叶适主张“道物并重”,强调“道在于器数,其通变在于事物”。“器数”即具体的制度、器物与名物度数,“事物”即各种社会实践。他认为,“道”并非超越于经验之外,而是内在于具体的历史经验与制度变迁之中。因此,治学不应是空谈义理,而应深入考察历史与制度的沿革,从具体的“器”中去把握普遍的“道”。因此他说,

“欲折衷天下之义理,必尽考详天下之事物而后不谬”。

(三)求实精神的历史回响

从王充到陈亮、叶适,浙学传统中“求实”的本体论立场并非孤立的现象,而是在后世思想家的论述中不断得到回响与深化。元代的金履祥在继承朱子理学的同时,同样强调“刻苦求实”的治学原则,其教学原则中包含了“推类触长、刻苦求实”等维度。明代的刘基提出“圣人作经以明道”的文学经世论,强调“儒者有用之学”,其思想体现了“经邦济世、学以致用”的追求。清初的黄宗羲提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著名命题,将本体论最终落脚于具体的实践工夫,进一步深化了“道不离器”的哲学传统。全祖望则在其学术中贯彻“实心求是、实学求是、实事求是”的精神,坚持“史以纪实”史学观,将求实精神贯彻到历史研究中。这种“求实”的本体论,确立了尊重经验、重视现实的认知态度,反对空谈、讲求实效,为价值观与实践论奠定了逻辑前提。“道不在虚”而在“实”,为人在现实世界中的正当追求(如利益、事功、创新)提供了存在的合理性。

三、“务实”：“崇义养利”的价值论

如果说“道不离器”的本体论回答了浙江人如何看待世界“是什么”的问题,那么“崇义养利”的价值论则回答了浙江人如何判断是非、决定取舍的问题。在与朱熹理学的对峙中,浙学不仅在本体论上坚持了务实取向,更在价值论上完成了一场颠覆性的革命,即大胆地肯定人的合理私欲与物质追求,将“利”纳入“义”的范畴进行统一考量,从而打破了传统儒家“义利对立”的伦理藩篱,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了坚实的道德正当性。

(一)陈亮:“义利双行”的价值突破

在“王霸义利之辨”中,陈亮对朱熹正统义利观的冲击是直接而深刻的。朱熹无情地批判陈亮的学说为“专言功利”,是“义利双行、王霸并用”,认为这种思想会误导人心,导致社会道德崩溃。然而,陈亮却在此基础上构建了自己独特的功利主义价值论。他并不否定“义”的高尚性和必要性,但认为脱离“利”而空谈的“义”是苍白无力的。所谓“王道”与“霸道”、“天理”与“人欲”、“义”与“利”之间,并非如朱熹所断言的那样水火不容。相反,它们是统一的,并无本质区别。真正的“道义”,恰恰需要通过现实的“功利”来体现。利是义的基础和内容,义是利的保障和升华,鼓励人们去追求正当的利益,也只有国强民富、社会安定,个人的道德修

养和国家的大义才有所依附。他痛陈当时士大夫“安于君父之仇”“低头拱手以谈性命”的腐朽风气,大声疾呼:“今世之儒士,自以为得正心诚意之学者,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也!”这一批判,将空谈性命的理学弊端暴露无遗。

(二)叶适:“既无功利,则道义乃无用之虚语”

如果说陈亮是从政治和历史的角为功利正名,那么叶适则是从更深的哲学和道德理论层面,构建了一套更为彻底的功利主义价值哲学。他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批判,堪称思想史上的名言。他指出:“‘仁人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此语初看极好,细看全疏阔……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尔!”并认为如果一种“道义”完全不产生任何实际功效,不对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富强有丝毫帮助,那么这种“道义”本身是空洞的、无用的,甚至是不真实的。真正的“道义”,恰恰应该落实为对人民有益的、能够产生实际好处的“功利”。叶适进一步阐明了“崇义以养利”思想。他并不主张追逐私利的极端功利主义,而是强调国家的“义”——公平正义的制度和道德秩序——是保障和促进合理“利益”的前提。他向宋孝宗阐述“崇义以养利,隆礼以致力”的治国理念,认为古人所说的“利,义之和”以及“义,利之本”,都揭示了义利之间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他将“义”视为保护和催生“利”的根本条件。这种观点,既批评了理学家只讲道义不讲功利的“疏阔”之弊,又避免了走向唯利是图的极端。这是一种理性的、深刻的功利主义,它将“利”的实现视为检验“义”之真伪的标准。

(三)从黄宗羲到近代:义利统一观的制度深化

义利合一的价值观在明清之际得到了理论上的进一步升华。黄宗羲基于对传统“本末”观念的深刻反思,首次提出了“工商皆本”的思想主张。他指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这一理论贡献,接续了南宋以来事功学派的义利观,并为其赋予了系统化的政治经济学基础,标志着浙江地区功利主义价值观的成熟。黄宗羲还提出“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的人性论,认为自私自利是人的自然本性,不能也不应被否定。“有生之初,人各自私也,人各自利也。天下有公利而莫或兴之,有公害而莫或除之。”这一思想打破了理学家“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为人的私利追求提供了哲学上的正当性。同时,黄宗羲并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肯定私利上,而是通过“公利”与“私利”的辩证

关系,提出了“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的更高要求,实现了从“私利”向“公利”的升华。这一价值观,在近代浙江思想家的论述中得到了延续。如晚清维新思想家宋恕,其“重视民本、关注下层民生,强调变法的实际效果及可行性”的务实思想,以及陈虬以追求实效为特质的思想等,与南宋事功学派一脉相承,构成了浙江精神中“务实”价值论的谱系。

从陈亮的“义利双行”,到叶适的“崇义养利”,再到黄宗羲的“工商皆本”,浙学传统在价值观上完成了一次关键性的突破。它不动摇儒家“义”的崇高地位,却重新定义了“利”在道德评价体系中的角色。将道德的必然性(义)与现实的必要性(利)统一起来,拒绝将两者对立。这一价值观肯定了人的合理利益诉求,为民营经济的发展扫清了思想障碍,使“务实”“讲求效益”的品格从功利性选择上升为道德性要求,为经济伦理提供了理性框架,强调在追求利益的同时必须承担社会责任。这正是当代浙商精神中所强调的“义利兼顾”“利责统一”的哲学源头。

四、“践实”:“知行合一”的实践论

如果说“道不离器”的本体论与“崇义养利”的价值论解决了浙江精神“怎么想”与“认为什么是对的”的问题,那么“知行合一”的实践论则回答了“怎么干”这一最关键的问题。一套思想体系如果不能转化为有效的社会实践,便无法真正成为塑造文化性格的力量。浙学传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发展出了一套高度重视“行”的实践哲学,强调知识必须与行动相统一,学问必须经世致用,从而架起了从思想通往现实的不朽桥梁。这为浙江人“敢闯敢干”“身体力行”的行为特质提供了最本源的哲学驱动。

(一)王阳明:“知行合一”与主体行动力觉醒

王阳明心学的产生,是浙江实践哲学发展的顶峰。他提出的“知行合一”与“致良知”学说,不仅是对传统知先行后、知行分离之弊的深刻纠偏,更是一次关于人的主体力量的伟大觉醒。王阳明提出“知行合一”的命题:“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在他看来,“知”与“行”是一体两面、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真正的“知”,必然包含着行动的趋向,本身便是行动的起点;而真正的“行”,也必然包含着对行动之价值、意义和方向的理性判断,是“知”的完成。如果一个人口头上说“知道”某事正确,却迟迟不去实践,那么王阳明认为,这个人其实并不知道,他的“知”是虚

伪的。他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这一观点,斩钉截铁地将“行”提升到了本体的高度,赋予了行动以先天的合理性。王阳明进一步指出:“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这一论断看似激进,实则有其深刻的用意:它针对的是明中叶以来士人“知而不行”“言行不一”的虚伪风气,旨在唤醒人们内心的道德自觉与行动勇气。王阳明强调“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将判断是非的标准从外在权威转回到个体内在的良知,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独立思考与行动的勇气。王阳明本人就是“知行合一”的典范:他文能讲学立说,创立“良知心学”;武能运筹帷幄,南赣剿匪、南昌平叛、广西定乱,功勋卓著。他一生坎坷,在龙场绝境中“悟道”,最终成就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传奇。他的实践精神,成为浙江人特别是浙商群体的精神图腾。

(二)黄宗羲:“力行实践”对心学空疏的纠偏

如果说王阳明是从心性哲学的角度论证了“知行合一”,那么明末清初的黄宗羲则将这一思想与更具现实关怀的史学考据、政治批判相结合,发展出了一种“经世应务”的“力行”实学,将浙江精神的实践性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黄宗羲身处“天崩地解”的明清之际,对明末心学末流空谈心性、脱离实际的学风深恶痛绝。他尖锐地批判道:“今之言心学者,则无事乎读书穷理;言理学者,其所读之书不过经生之章句,其所穷之理不过字义之从违……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在他看来,这种学风是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他力主回归经典,主张“穷经”与“读史”并重,强调“经术所以经世,方不为迂儒之学”。黄宗羲对“知行合一”的阐释,落脚点在一个“行”字上。他创造性地解读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认为“致字即是行字”。他提出:“先生致之于事物,致字即是行字,以救空空穷理。”在他看来,“致良知”不是向内的静坐冥想,而是一种向外的道德实践,是在具体事务中落实良知的“行”的过程。他提出“心无本体,工夫所至,即其本体”的著名命题,将哲学本体论的探讨最终落脚到具体的修养工夫和实践活动中。他推崇“必以力行为工夫”,认为学问的真伪与价值,最终要通过力行实践来检验。黄宗羲本人的实践,同样令人肃然起敬。他早年参加抗清斗争,失败后隐于著述,以“天下为公”的理想,创作出划时代的政治学著作《明夷待访录》,其“天下为主,君为客”“工商皆本”等思想,极具前瞻性和批判性。他以史学研究为武

器,编纂《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开创了清代浙东史学的新局面。黄宗羲的学术,始终贯穿着对国家命运和现实政治的深切关怀,是“经世致用”精神最杰出的体现。

(三)陈亮、杨简等人的实践品格

除了王、黄二位杰出代表,浙江思想史上的其他重要人物也无不体现着这种强烈的实践取向。陈亮一生反对空谈性命,力主“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虽为文人,却“慨然有经略四方之志”,多次上书朝廷,陈述抗金大计,甚至在晚年迫于形势,不得不应举以求一展抱负,其本身就是“事功主义”哲学的完美实践。四明心学的代表人物杨简,同样并非埋头书斋的思辨学者,在地方为官四十五年,政绩卓著,深得百姓爱戴,他所主张的“道德实践主义”,不仅是对“本心”的体认,更是要在具体的行政、司法、教化中落实这份仁心,他的学问与道德实践是高度统一的,是知行合一、体用不二的体现。当代有学者指出,杨简心学“以实心、实修、实政为核心,三者由本心统贯、浑然无间”,其思想贴近日常人伦,强调一念之微的修养与因时制宜的实践。此外,吕祖谦的“讲实理,育实才而求实用”,全祖望的“实心求是、实学求是、实事求是”,章学诚的“六经皆史”与“言性命者必究于史”,无不是对“践实”精神的深刻诠释。这些思想家的实践品格,共同塑造了“学以致用、知行合一”的优良传统。

(四)近现代的回响:从龚自珍到鲁迅

这种“践实”精神在近现代浙江思想家身上得到了延续和发扬。龚自珍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呐喊,呼唤社会变革;章太炎以“排满革命”的激进行动,推动民族觉醒;鲁迅以“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担当,以“立人”为事业;马一浮作为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其“六艺论”虽然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但其“复性”学说同样强调“主敬、穷理、博文、笃行”的实践路径,主张“性修不二”。这些思想家的行动无一不秉承着“知行合一”的实践传统,将文化批判与社会改造紧密结合。当然,浙学传统中的实践论,并非简单的“行动优先”论,而是一套完备的、具有内在逻辑的哲学体系。它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哲学突破出发,高扬了人的主体精神和行动的正当性;又通过黄宗羲等浙东学者的具体践行,将这一哲学落实为“经世致用”的学术方法和社会批判;更通过思想家的身体力行,将这一精神内化为浙江人的文化基因,养成了浙江人“身体力行、不尚空谈”的行为准则,催生了“将知识转化为行动”的强大能力,揭示了“在

实践中检验真理”的内在标准。正是这种“践实”精神,使浙江人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能够率先突破体制束缚,大胆创新,勇于实践,创造出举世瞩目的“浙江奇迹”。

五、结论

“求实”奠定认知基础,“务实”激发价值动力,“践实”完成行动闭环。这三者共同构成了浙江精神牢不可破的“哲学底色”。这一底色并非外在于人的抽象教条,而是一套成功的、内化于人心的理性认知框架和行为指南。它解释了为什么浙江人能够在资源匮乏、条件不利的情况下,通过自己的努力创造出经济奇迹;它也解释了为什么浙江的思想界总能开时代风气之先,引领社会变革的思潮。我们将其命名为“唯实论”,以区别于那种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唯心论”倾向,也区别于那种唯利是图、不讲道义的极端功利主义。浙江精神的“唯实论”,是一种将“实”作为最高价值取向的哲学自觉,它既尊重现实、注重实效,又坚守道义、追求卓越,在“实”中实现“真”与“善”的统一。

理解这一哲学底色,不仅是认识浙江文化传统的钥匙,更可以为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区域发展提供重要的文化哲学启示。它深刻地表明,尊重现实、肯定人的合理利益并积极付诸行动,不仅不是道德的对立面,恰恰是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民福祉最坚实的文化动力。浙江精神的“唯实论”底

色,在它诞生的土地上,已经并且将继续展现其跨越时代的生命力。

参考文献:

- [1] 吴光. 浙江儒学总论:从王充到马一浮——论浙江儒学的思想特色与精神价值[J]. 浙江社会科学, 2020(6): 94-105, 158-159.
- [2] 李广超. 宋恕思想与浙东学术传统渊源关系探析[J]. 兰台世界, 2016(12): 95-98.
- [3] 陈安金, 冀晋才. 陈虬思想变迁研究[J]. 浙江学刊, 2014(6): 74-80.
- [4] 杨太辛. 实心求是 实学求是 实事求是——全祖望的学术精神及其实践[J].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05(5): 89-98.
- [5] 吴光, 主编. 黄宗羲全集[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5.
- [6] (宋)朱熹. 答陈同甫[A]. 朱熹文集编年评注(卷三十六)[C]. 福州: 福建人民出版社, 2019.
- [7] (宋)陈亮. 陈亮集(增订本)[M]. 邓广铭,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 [8] (宋)叶适. 叶适集[M]. 刘公纯, 等,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 [9] (明)刘基. 刘基集[M]. 林家骊, 点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9.
- [10] (清)李邕嗣. 杲堂诗文集[M]. 张道勤, 校点.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3.

The Realist Underpinning of Zhejiang Spirit: Evidence from 100 Historical Zhejiang Thinkers

WANG Wen-hua

(Zhejiang Financial College,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a systematic study of nearly 100 Zhejiang thinkers across histor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Realism” is the core essence of Zhejiang Spirit. It consists of the truth-seeking “Dao in Vessel”, pragmatic “righteousness with utility”, and practice-oriented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This trinity shapes Zhejiang people’s reality-focused, result-driven and action-oriented mindset, offering a profound cultural-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for the “Zhejiang Phenomenon”.

Key words: Zhejiang Spirit; Realism; Dao in Vessel; unity of righteousness and utility;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